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开展劳务协作,助力脱贫人口就业——

点对点帮扶 全链条服务

■ 张云河 洪秋婷

“稳!”坐上赴粤返岗复工“点对点”免费直达班车的许承烛笑呵呵地说,“车子稳,心里更踏实。”

许承烛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天等县把荷乡旺仁村那皮屯人,从小身体残疾,行动不便,早些年待业在家。“得益于粤桂扶贫协作,我才甩了贫困帽。”原来,天等县与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结对帮扶,开展东西部劳务协作,许承烛也因此被人社部门推荐到蓬江区华方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从事摩托车配件加工制造工作。

“工作人员给我们逐一做好身份登记,安排核酸检测。政府还包车免费接送我们,令人安心。”许承烛说。

全面摸清就业需求 政府搭台培训技能

天等县位于桂西南左右江的分水岭上,石山遍布,发展资源不足。为了让脱贫劳动力稳在企业、稳在岗位,天等县与蓬江区携手,精准施策,多措并举促进稳岗就业。

想从事什么工作?愿意在本地工作还是到外务务工?家庭成员对政府提供的劳务服务有什么诉求?……依托驻村工作队、帮扶干部、基层协管员等力量,天等县落实主体责任,对脱贫劳动力进行全面调查摸底,初步掌握群众的就业需求。许承烛说:“村干部间的问题很细致,对我们的关心也很周到。”

能提供什么样的工作?利用粤桂协作专场招聘会、村级LED显示屏、‘桂

聘’网络平台、基层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天等县有针对性地发布粤桂企业的用工信息。”2021年以来,天等、蓬江两地举办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71场,累计提供21396个就业岗位。”天等县人社局局长王玉云介绍。

天等县以农村脱贫人口作为技能培训的重点对象,推行“政府搭台,校企合作,精准培训”的模式,建立培训需求清单,实现培训与就业的充分对接。原建档立卡户能够免费获得中式面点师、粤菜师傅、母婴护理等订单、定岗、定向式培训。近3年,当地共组织举办各类技能培训184期,培训7471人。

天等县天等镇四维村龙文屯的零桂兰是一名80后,初中毕业后就到广东务工,因缺乏技能,找工作不太顺利。去年11月,得知天等县和蓬江区开设粤桂协作母婴护理培训班,她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参加了培训。经过10天的技能培训后,零桂兰获得了崇左市人社局和江门市人社局联合发放的“母婴护理结业证书”。“如今,我已经找到对口工作,每个月工资3000多元。”零桂兰说。

产业援建也是粤桂劳务协作的重要一环。近年来,蓬江区充分发挥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对天等县具有一定规模、能带动一定数量原建档立卡户劳动力就业的就业帮扶车间给予创建扶持。截至目前,粤桂协作援建就业帮扶车间20家,共帮扶天等县创建就业帮扶车间338家,带动就业2.23万人。

精心做好运输保障 设置返乡返岗专车

“从天等到蓬江,全程大约要14个

小时。我们两个司机轮换休息,确保大家能安全抵达。”天等县汽车站大巴司机赵仁恩说,“作为‘点对点’班车的司机,能帮助到农民工兄弟,我感到很荣幸。”

出家门进车门,出车门进厂门。采取直达单位“点对点”集中输送方式,成规模、成批次将务工人员直接输送到务工点的举措,是这些年天等、蓬江两地为保障城乡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有效举措。

天等县和蓬江区两地人社部门互设劳务输出服务站,贴心做好脱贫劳动力转移就业、劳动维权等服务。“通过‘点对点’集中输送,我们为农民工提供‘保姆式’服务。前不久,有17趟专车将619人输送至广东务工,其中有290名脱贫人员。近3年来,累计免费运送13889名农民工返岗务工。”天等县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黄明河说。

与此同时,蓬江区也积极做好运输保障工作。据了解,今年春节前后,蓬江区人社局定制包车业务,探索建立“节前送、节后接”运输模式,开展“蓬江区——天等县”“点对点”专车服务,帮助32名天等籍脱贫人口安全顺利返乡过年。“政府派车一站一站地来接我们,上车前消毒、测体温,发放防疫暖心大礼包,每个流程都认真细致。”在“点对点”返乡专车上,江门记记公司的天等籍务工人员梁伟斌说。

“我们的专车服务切实解决了务工人员回家一票难求的问题,减少了公众场合聚集,降低感染病毒风险,确保了务工人员健康返乡。”蓬江区人社局就业创业促进股股长文燕军说,他和同事

们认真收集分析了天等籍务工人员出行需求,确定好乘车人员名单和运行线路,制定了科学合理的返乡运输专车保障方案,确保异地务工人员安全顺利返乡。

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落实各类优惠政策

“双方签订劳务协作框架协议”“互建劳务输出服务站”“共同组织‘点对点’专车服务”……江门市自2017年9月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帮扶崇左市以来,坚持以开展高质量劳务协作为对口帮扶核心要素,将江门市就业空间优势与崇左市资源禀赋相结合,建设平台、优化服务、稳定就业、提升技能。

“三来三往”的招聘模式,让蓬江区和天等县互相来往,精准帮助劳动力转移就业。具体分为三步走:一是崇左市“来”调查脱贫劳动力就业意向,形成“求职清单”,江门市“往”企业收集相关岗位信息,形成“岗位供给清单”;二是根据崇左市提供的脱贫劳动力“求职清单”信息推“来”就业岗位,江门市“往”企业推送相应的脱贫劳动力就业信息,进行“岗位匹配”,达成初步就业意向;三是崇左市组织脱贫劳动力“来”参加现场招聘会,江门市“往”企业输送合适脱贫劳动力。

“我们坚持每月进行岗位信息对接,2021年双方共发布12期‘清单’,累计814家企业参加,提供6435个岗位,需求员工38504人。今年已经发布3期‘清单’,累计131家企业参加,提供529个岗位,需求员工3988人。”江门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长江北岸楚玛尔河一角(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张 龙摄

任”,三江源国家公园进行的一系列原创性改革和探索,为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提供了宝贵经验。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田

俊量说,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已经有了良好开端,但仍需要在摸索中不断完善,“这项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来源:新华网)

“合力”守“水塔” 让碧水浩荡东流

■ 吕雪莉

三江源,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青海省南部,是我国淡水资源的重要补给地,每年向中下游输送600多亿立方米清洁水,有“中华水塔”之称。

在上世纪末,因气候暖干化和不合理人为活动,三江源的生态一度退化恶化,河流频频断流,湖泊大量消失,野生动物锐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重点改革任务。作为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2016年3月,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全面启动。

创新生态保护管理体制机制,是国家赋予三江源国家公园五大试点任务之一,也是最大难点。

青海省在试点中,将过去分散在林业、国土、环保、住建、水利、农牧等部门的生态保护管理职责进行整合,建立了以管理局为龙头、管委会为支撑、保护站为基地、辐射到村的新型生态保护管理体制。同时,建立园地协同运行机制,推动园地间形成共建合力。

“国家公园和地方政府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家公园建设得到了地

方的大力支持。”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王湘国说,过去一直是“林”管林,“草”管草,“水”管水,整合后,弥补了监管不到位的短板,实现了系统管护。

近年来,“7·26”非法捕杀藏野驴案、“8·23”非法采金案等大案要案得以接连破获,都是生态管护员在巡护中发现的线索。黄河源园区管委会生态保护站站长韩常鹏表示,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记者了解,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全面启动以来,取得多项国内第一:第一个发布林地、草地、湿地、地表水四大自然资源本底报告,第一个完成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试点,颁布施行第一个由地方立法制定的国家公园条例……

在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的同时,千百年来逐水草而居的牧民们吃上了生态饭。

“这些年,湖面越来越大了,再也不用赶着牛羊去别处放牧了。”44岁的尼玛扎西家住扎陵湖北岸,是玛多县扎陵湖乡卓让村的牧民。多年前,因黄河断流牛羊吃不上水,他们家曾不得不远走他乡。而今,他成为一名生态管护员,一边放牧,一边巡护湖泊和草场。

“像尼玛扎西这样的生态管护员,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后有两万多名。”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人介绍,在生态保护第一的前提下,建立“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公益岗位机制,是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最大的亮点。

青海省财政每年拿出3.7亿元资金,落实“一户一岗”政策,园区内每户有1名生态管护员,户均年收入21600元,有效调动了牧民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保护生态和民生改善实现“双赢”。

这些年,青海省抓住青藏高原气候暖湿化的窗口期,实施黑土治理、退化草原补播、封沙育草、湿地保护等工程,实现增草、增绿、增水;园区内48宗矿业权全部退出,实施生态修复,抚平生态疮疤……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如今,三江源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千湖重现,生态全面好转。

据2021年8月发布的《2020年青海省水资源公报》,近年来,青海三江源向下游输送水量年均增加近百亿立方米,2020年度输送水量为954.98亿立方米。

2021年初,在全国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验收评估中,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名列首位。

勇担“国家使命”,肩负“源头责

75.8%受访者表示在防疫过程中更重视邻里关系了

■ 孙 山 肖平华

邻居曾被称为都市生活中“熟悉的陌生人”。但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邻里之间的相处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以前交流不多的邻居,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彼此络络起来,有微信群中的相互打气、信息传达,也有疫情防控中的守望相助。

日前,本报对1151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5.8%的受访者表示在防疫过程中更重视邻里关系了,53.5%的受访者觉得疫情防控过程中与邻居关系更近了。

受访者中,00后占21.6%,90后占43.6%,80后占26.9%,70后占7.1%,其他占0.9%。来自一线城市的占24.1%,二线城市占38.3%,三四线城市的占24.3%,县城或城镇的占9.5%,农村的占3.8%。

53.5%受访者觉得与邻居关系更近了

家住西安的90后苏晓说,以前总是独来独往,遇到事情也是尽可能自己想办法解决,但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邻居间的相互帮助,让自己感受到了邻里情。“我去小区生鲜配送点取东西,看到有邻居家的就顺带取回来,邻居直接把食物分了一部分给我。我还跟邻居一起参加拼团,分享食品制作经验”。

家住河北的林辰,去年6月搬到

了一个新小区,平时一个人居住。最近因为有疫情,她所在的小区封闭管理。由于没有储备足够的主食,林辰试着在小区群里求助,“本想看谁家有余余的能卖给我,没想到邻居把蒸好的馒头分了一半给我”。林辰说,那一刻自己很感动,一下子就体会到了“近邻”的意义,“碰到事情了,还得靠邻居来帮衬”。

调查中,53.5%的受访者觉得疫情防控过程中与邻居关系更近了。交互分析显示,00后受访者觉得更近的比例更高(58.1%),一线城市受访者觉得更近的比例高于(55.6%)其他受访者。

“有个邻居在微信群里说,谁家不能做饭,我做好了你们来拿。我也把平时囤的方便面分给物资紧张的邻居。”在相互帮助的过程中,林辰感觉邻居之间的联系也变多了,“平常群里没人说话,但在防疫期间大家互相帮助,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小区里住的大部分是独自生活的年轻人,之前也不怎么打招呼。”林辰感觉,邻里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在新小区中尤为不容易。“大多是租户,不像老小区人们居住时间长,彼此更加熟悉。但在防控疫情的过程中互相帮助,大家很快就熟悉了,甚至约了疫情结束后一起聚餐”。

数据显示,在防疫过程中75.8%的受访者更加重视邻里关系了。

“社区组织化程度的增加,为邻

里建立了一种相互连接的方式。”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教授分析,在都市生活中大家是一种原子化、个体化的状态,但社区组织化程度加深,拉近了邻里之间的关系,加强了交流,原来都市里陌生人的社区慢慢变成了熟人社区。疫情的发生更是把大家都联系在了一起,在社区中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增强,“这是因为有共同的事件,特别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事件,把大家联系在了一起”。

58.0%受访者表示与邻居相互帮助的经历多

赵艳(化名)和室友租住在上海一个小区里。居家期间,她感觉到邻里关系被拉近了,感受到了来自邻居的温暖。

赵艳说,刚开始居家时,自己没有加入很多小区群,后来需要采买物资,她在同楼的微信群询问经验。这时热情的对门邻居,把她拉进了好多小区买菜群,“我才能及时囤了很多食物。后来听说对门没有消毒纸巾,就赶紧送了他们一包”。

数据显示,58.0%的受访者表示在防疫过程中与邻居相互帮助的经历多,其中15.0%的受访者觉得非常多。

经过与对门邻居的几次互动,赵艳表示相互也有了更多了解。“他们是一家三口,有次送了我 and 室友一大袋水果和蔬菜。后来对门阿姨还给

我发微信说,觉得我们两个女生在大城市工作不易,自己也有女儿,把食物送给我们,也是希望自己女儿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能被温柔以待”。

赵艳说,看到消息那一刻很感动,也觉得很暖心。“因为家人都在外地,为了不让他们担心,没告诉他们小区已经封闭管理了。在物资紧张的时刻,能分享这么多蔬菜水果,不是件容易的事”。

家住北京的85后张弘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自己很怀念以前邻里密切互动的时光,“谁家炖肉了,会给我们分,如果家里缺少什么东西,也可以随时跟邻居借。有时会感慨现在住在一个楼里,都不知道对门姓什么,家里几口人”。

不过,张弘感觉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邻里之间的联系加强了。“前段时间周边小区有疫情,我们小区也加紧做了几轮核酸。碰到邻居就会相互提醒,防止错过群里的消息。排队过程中,也会聊家常。社区里还有很多退休的大爷大妈,会参与到防疫工作中,提醒大家注意防疫政策”。

张弘觉得,邻里的互相帮助,可以形成一种无形的力量,让大家更有勇气共克时艰,“虽然平时关起门来互不打扰,但在有需要时依然会给予对方温暖”。

数据显示,分享防疫信息(54.0%)、相互提醒防疫措施(49.3%)让受访者觉

得与邻居关系更紧密了。然后是交流生活经验(47.2%)、相互打气鼓劲(45.6%)。其他还有:帮助买菜、运送物资(38.1%),帮助照顾老小(28.4%),解决生活难题(24.6%)和参与社区防疫工作(20.4%)等。

赵艳说,以前忙于工作,碰见邻居很少会聊天,但最近在微信群中渐渐了解了邻居的情况,“大家在群里除了以物易物、组织团购,还会聊天,聊工作、养孩子的体会等,都是很接地气的话题,能感受到大家都在努力地生活”。

文军教授认为,社群等新媒体方式为邻里提供了一种连接形式,但真正意义上的互动和连接,需要通过线上和线下共同加强,可以为更好的邻里关系打下基础。“比如在疫情中,小区建立的各种资源服务队,通过线上方式报名组建,依靠新媒体的形式连接起来,但最终紧密的联系还需要线下的互动。网络社会的来临,不能替代传统的面对面互动,只有在直接互动中才能有更多真情实感”。

苏晓觉得,虽然在疫情防控中,邻里间互帮互助的都是一些小事,但足以带给自己温暖,“居家的时候,通过跟邻居在微信群里聊天,看他们的朋友圈,心情也会有所缓解,感受到了来自周围人的关心,这是一种有力的社会支持”。

(来源:《中国青年报》)

——媒体之声——

以数字化提升教育发展质量

■ 徐晓明

2022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这是我国教育事业一项重要的改革举措,将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教育数字化将深化我国教育理念变革。教育数字化不是简单地将传统教育方式线上化或视频化,而是通过全过程教学大数据的采集、分析和应用,将传统经验性教学向以数据交互、信息评估为主的数字化教育转变,推动教育和学习活动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工作者不仅需要掌握基本的信息技术工具,更需要用数字化的理念审视和指导教育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

教育数字化将促进教育资源公平配置。各地实践也证明,通过教育数字化,可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逐步缩小优质教育资源的区域、城乡差距,大力促进教育公平,让亿万孩子共享优质教育、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教育数字化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条件。依据每个学生的能力、潜力、创造力以及学习进度等数据,智能化的数字教育可以分析不同学生的学习情况,借助学习过程中双向数据反馈进行教学过程诊断与评价,科学引导教师差异化指导学生,为学生制定个性化学习方案。

数字技术与教育事业融合发展,必将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的变革。适应这一趋势,构建更加健康、更加多样、更具活力的教育生态,“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这一美好愿景就能加速变成现实。

(来源:《人民日报》)

让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

(来源:《人民日报》)

■ 向 秋

进入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重心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是激发乡村人才活力的重要支撑。

加大“吸引”力度,让外流变回流。要因地制宜出台政策,健全农村干部培养锻炼制度,建立各类人才定期服务乡村制度,健全鼓励人才向艰苦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激励制度,建立县域专业人才培养使用制度,形成乡村集聚人才的强大引力,让更多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进入乡村、服务乡村、留在乡村。

加大“培养”力度,扩总量提质量。要尊重乡村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人才,实施差别化培养措施。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基层实践迫切需要,突出重点,加快培养农业生产经营人才、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人才、乡村公共服务人才、乡村治理人才、农业农村科技人才。坚持多元主体、分工配合,推动政府、培训机构、企业等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参与乡村人才培养,形成人才培养合力。

加大“使用”力度,展才华显身手。乡村振兴是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方位的振兴,要为各类人才干事创业和实现价值提供机会条件,让其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要以推动乡土人才返乡创业为抓手,增强乡土人才引领发展的新优势。要聚焦产业链打造人才链,围绕乡村振兴事业发展激发人才活力,让广阔的乡村成为人才干事创业的热土。

(来源:光明网)

在外贸开局中感受中国经济“暖意”

■ 杨 飞

近日发布的外贸首季报显示,前三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超10%,连续七个季度保持同比正增长。来之不易的外贸成绩单,有力展示了我国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取得的重大成果。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出台系列举措,以解决外贸产业链供应链难点堵点,帮助中小微企业防范风险、降成本、增活力。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协同发力、靠前发力,印发《关于用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支持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通知》,鼓励各地用好服贸基金等直接融资手段,推动金融保险机构与外贸基金合作开展金融服务创新,缓解外向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当然还应当看到,我国对外贸易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压力。从需求侧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起伏反复,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外需市场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从供给侧看,供应链瓶颈短期内难以缓解,能源、原材料供应仍然偏紧。这就要求有关部门继续锚定保稳提质目标,多措并举持续发力。我们要坚定不移走开放促发展的道路,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引领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提高我国外贸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努力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外贸稳中提质的发展趋势没有变。在高水平开放的带动下,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建设,着力打通“堵点”“卡点”,国内国际双循环会更加畅通,高质量发展之路也将越走越宽广。

(来源:中国经济网)